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23

新时代国家形象教育的路径融合

李学¹, 李婕²

(1.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国家形象教育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式。当前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国家形象教育以一元化知识灌输为主,存在忽视个人经验参与、行为能力培养等问题,需要根据教育阶段属性整合教育资源,在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互补、共同记忆与个体经验同构、单向灌输转向多重话语的路径融合过程中,达成价值认同与行为实践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国家形象教育;意识形态;新时代;路径融合

中图分类号:G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174-06

习近平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①。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深厚情感的集中体现,必然建立在良好的国家形象基础之上。国家形象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受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涉及传播、政治、文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典型特征。当前的国家形象研究对象定位主要是国外民众,强调群体接受,侧重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突出文化认同、品牌效应。受此影响,国家形象教育长期以来都是局限于用传统说教方式、一元化话语模式灌输固定的中国形象,很少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基础、经验背景以及个人行为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关系。整合教育资源,理顺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共同记忆与个体经验及话语单向传递与多重视角等关系,突出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行为能力培养,多渠道、全方位正面建构体现新时代特色的中国主形象,是增强国家意识,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求落到各级各类教育实处的应然路径^②。

一 新时代国家形象教育指向融合: 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互补

国家形象是特定主体对具体国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愿景高度凝练后得出的整体印象。从时间的维度可区分为历史、当前与预期的国家形象,“认识现在中国形象是服从于建构未来中国形象的,而同时,这种建构也必须从这种认识起始”^③。根据认知视角可分为自我认知的国家形象、他者视角的国家形象,文化差异是影响认知结果的关键因素,在文化交流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者视角会不同程度影响自我认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展国家,坚持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需要克服所谓的西方人权理念和普世价值观负面影响^④。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国家形象教育应当以中国为主、辅以有代表性的他国形象,需要体现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毕业后公民生活的阶段特征,需要超越简单的事实和信息层面,体现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理想要求。青少年学生接受能力较强而阅历较少、批判意识较强但理性不足,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可塑性,其国家形象教育应充分考

收稿日期:2019-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HA190144)

作者简介:李学(1974—),男,湖南桃江人,教授,主要从事教科书、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

①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

②阎国华,何珍:《国家意识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培育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页。

④陈伟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新闻界》2019年第3期。

虑已有的经验基础,区分共同理想指引和现实印象之间存在的差异,正确对待他国视角中中国形象的影响,还要形成恰当的他国形象,避免狭隘的爱国主义或崇洋媚外思想。

青少年学生国家形象教育中的自我认知主要指向于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首要的是以中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根基。“在五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①从古至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一直都是仁人志士奋斗的精神支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等至理名言,真切表达出中国人民在国家危难时刻的坚守与追求。然而,在对外交流频繁、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不断冲击中华传统文化情况下,变革的时代使青少年学生成长具有明显的特征:处于数字化与网络化环境中容易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下迷失方向,很难在个人发展、国家崛起和民族发展之间形成直接经验关联。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镜,方能过滤形形色色的外在干扰,辨析各种不同认知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以正确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其次,要区别对待中国形象塑造与建构过程中的不同声音。除正面的中国形象教育之外,还需要客观分析中国历史及当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与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要有力批判过于夸大问题而丑化中国形象的观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相比西方社会有着明显区别,由此形成的家国意识、生活习惯、行为态度也与之有较大差异^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某些社会现象、个人行为与理想预期存在一定距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国家形象教育中不应回避的问题,需要着眼未来,从个人素养提升与国家形象改善关系两个维度同时提出解决办法。刻意夸大问题,将支流当作主流,将现象当作本质,如“中国威胁论”、海洋文明优越论等极端观点,则应坚

决予以驳斥。

青少年学生国家形象教育的世界图景意味着从他国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形象认知以及正确建构其他国家形象。培养国际视野,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形象教育的重要维度。良好的国际形象会大大激发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消极甚至负面的形象会无形中贬低对自己国家的整体判断。“研究表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增加,卷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越强,跟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摩擦与冲突越多,世界对中国的正面与负面看法,都将呈几何级数增长。”^③从其他国家的文化取向分析他们的中国形象,能够帮助学生更为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同时,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出国留学及来华留学生大规模增长等因素影响,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国际交往机会将越来越多,因而他国形象教育的作用也日显重要。需要改变“刻板印象”,在基于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评价其他国家,包括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欧美国家并不必然是自由、民主的天堂,非洲国家并非经济欠发达、政治不稳定、战争频繁的代名词。特别是要破除“东方主义范式”的消极影响,改变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评价其他国家唯一标准的做法,尊重不同国家基于传统形成的文化取向及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

二 新时代国家形象教育内容融合:共同记忆与个体经验同构

国家形象可表现为一国政治领域的直接“宣传型”符码表征、媒介领域的间接隐含型价值渗透,还可“镶嵌”于文学艺术之中“潜意识地劝导”和暗示^④。建构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是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关乎未来一代的国家情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革命之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

①刘顺厚:《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基于多元文化的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0页。

②周德义,周银:《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审视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刘康:《利益、价值观和地缘政治:中国崛起的全球民意调查》,载范红主编:《国家形象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④刘丹凌:《国家形象建构:作为表征意指实践的“文化循环”》,《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化”^①,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充分说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国家形象不仅包括国家政权、经济、地理、资源等显性可感的内容,而且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隐性内容。国家形象教育需要有效呈现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记忆,也需要将过往的、外在的内容与民众当下生活经验整合,使之能够表现并引领国家发展现实,从而凝聚民心,引导包括广大青少年学生在内的人民群众在实现共同理想的道路上齐头并进。青少年学生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观念,相对于以说教方式灌输的国家形象知识,网络、影视等流行文化更容易发挥其潜在的“教育”功能,因而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怎样将共同记忆融入个体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形象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

基于共同记忆的青少年学生国家形象教育应超越典型符码表征和道德说教的层面。用龙、东方古国、汉字等代表中国形象,只能说是面向没有任何中国生活经验的“他者”的一种选择,针对中国历史、当下国情及未来发展展望的教育,只能算是基础性认知,国家形象教育应将共同记忆中零碎的内容系统化、分割的内容整合化、教条的内容思想化,帮助学生正确、全面、理性建构国家形象。一是呈现国家形象发展的清晰脉络。两千年古老文明、近代百年积贫积弱、当代发展辉煌成就及小康社会共同理想需要汇成一条总线,才能激情而不失理性地去除国家形象认知中的各类遮蔽,克服沉湎于灿烂文明的过度优越感、西方中心观念导致的自卑感和虚无感、因国家快速崛起产生的膨胀感及奋斗精神丧失的满足感等种种问题。二是选择能引发深度思考的具体内容。国家形象教育内容寄寓着特定教育目标,其最终的意义需要由学习者完成,因而要尽量接近受众心理,尽量摒弃或少用呆板的说教。“中国喜欢‘高大上’的宏大叙事,‘接地气’的话语少;话语的政治意味浓,生活气息少,这样的话很难让国际受众产生共鸣,更不可能被认同。”^②教育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人云亦云地照着说或口是心非地跟着说,难以

有效启发学生思考教育内容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无法达到国家形象教育的初衷,甚至其教育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三是提供国家形象的比较参照。“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认同“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③,国家形象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综合,也包含着中外互观的结果,在媒介传播全球化时代后者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如果缺少比较的参照,隐含在各类媒体内的西方价值观中的中国形象也许会比正规教育更能影响青少年学生的看法。把握日常生活经验的、局限于个体的感知与具有理想色彩、经过价值过滤的典型之间的冲突,在理解与尊重“差异”中建构的国家形象,才更加具备真实性和可建构性。

共同记忆是特定社会共同体的经验概括,主导着教育方向和价值规范,但只有融于个体经验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和深度,共同记忆的传承与发展才会成为可能。青少年学生的观念既不是与生俱来,也非一成不变,塑造正确的、积极的国家形象首先要理性提升生活直接体验。“正因为早期儿童发展具有模糊性,故儿童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有着无限可能性;正因为早期儿童发展具有整体性,故儿童发展具有包容性,也即包容、孕育着个体其后发展的几乎一切重要的质素,诸如认知、情感、态度与价值偏好等在混沌中的孕育与生长。”^④生活经历影响着个体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但理性的高度不同,品味的深度就不同。同样身处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场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分别表达出伤感、怨恨和奋发图强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引导学生置身于社会宏观背景和历史长河中升华个人经验,可摆脱狭隘的经验局限而达于国家形象与个人愿望的逐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个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形成共鸣^⑤。其次,要有效整合已有的、关于国家形象的间接经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②刘影:《话语、国家形象与中国崛起——论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塑造》,《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

③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总序II。

④刘铁芳,孙意远:《儿童何以成为整全的生命:儿童教育的意蕴及其实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⑤赵晓霞:《文化记忆视角下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与策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验。学生时代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并逐步趋向定型的时期,在学科知识学习和生活经验中逐步奠定着国家形象认知基础,国家形象教育应摆脱重复学科知识或仅是在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简单增量的做法,内容可从“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的介绍”转向于“为什么这样理解”的深层次追问。引导学生思考中国古典文明在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节点以后从世界中心转向边缘,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为何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过程中态度屡屡变化,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向其他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输送什么样的价值观等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能够将学生对国家形象的认识由具性感知提到辩证理性的新高度。此外,国家形象教育中批判性方法与手段的运用也非常重要,“青少年学生在公共理性的批判过程中,不仅可以运用公共理性的思维来反思公共问题,同时也能更好地反省和澄清自己的价值观,从而获得公共理性能力的发展”^①。

三 新时代国家形象教育方式融合: 单向灌输转向多重话语

国家形象归根结底是文化的产物,“心理文化强调对世界所形成的预设、知觉与意象是个人与他人普遍共有的,而非个人所独有的”,“一个人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倾向决定了参与者如何解读冲突及这些解读又如何影响着他们所采取的行动”^②。国家形象教育过程中引导学生个体认同共同记忆所代表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的普遍共有选择,不可避免要经历冲突、顺应、同化甚至再冲突的心理历程。如果单纯迁就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国家形象内含的价值观念无法达成共识,如果简单灌输共同记忆的普遍要求,国家形象意识也难以体现为自觉的行动,因而需要把握共同记忆传承与经验的多重视角、正向认知强化与逆向反思批判之平衡,在国家形象教育的话语中既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真实呈现国家的历史和脉络,既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照中国

形象和其他国家形象,又合理回应异域“他者”的不同声音,既突出学校显性教育的主导价值,又充分开发利用网络报刊舆论话语中的隐性资源。“国家形象是无形的,能够直接把握的只有言说国家形象的‘话语’”^③,话语是国家形象教育的凭借,选择不同的话语方式,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教育效果。

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习惯于灌输一元化学术或官方话语,以纸笔测试为主的结果性评价方式也在强化这种话语方式的地位,而新时代的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环境中成长,多元、差异、个性的表现越来越突出,要求“我们应当寻求差异,倾听那些代表着差异的沉默各方的声音;然后,我们应当允许缄默的声音去讲话,说出与多数话语相反的原则或观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突出并容忍差异,并且可以走向多元理性而非一元理性”^④。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内核,又要用亲和的、符合学生经验特点的语言传递主流的国家形象观点,同时允许学生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在真实有效互动中解决主流观点接受所存在的疑惑,丰富对国家形象的认知。

将文学艺术想象话语与国家现实结合。相比意识形态思想,文学作品因其叙事方式和内容体现人类生活的普遍特征而更易为人所接受,并且潜在的教育效果非常显著^⑤。多数人是从小从唐诗宋词、绘画书法等艺术中感知中国传统审美趣味,通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了解英国、马克·吐温的小说接触美国,在《挪威的森林》中想象挪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的审美情趣层面,依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建构完整的国家形象,还需要将艺术想象话语置于国家特定阶段的社会现实才能更好地理解艺术,更深入的把握民族文化心理,从而实现国家形象的认同。

加强仪式话语的针对性。“对国家的忠诚与信仰需要学生有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认同感与归属感是通过教育中的政治仪式锻

①叶飞:《从“个人”到“公共人”——论道德教育如何培育人的公共品格》,《教育科学》2019年第1期。

②马克·霍华德·罗斯:《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刘萃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③刘影:《话语、国家形象与中国崛起——论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塑造》,《理论月刊》2017年第1期。

④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⑤潘娜娜,任成金:《西方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4期。

造的。”^①开学和毕业典礼、升旗仪式、纪念日活动、班团活动,都是具有政治仪式性质的国家形象塑造常规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说教化、套路化倾向,导致难以与学生心理产生共鸣。需要针对学生现实情况进一步加强其教育实效。近年来部分名校的开学和毕业典礼致辞在网络引发强烈反响,成为严肃的政治性和鲜明的生活性结合的典范,值得学习推广。另外,应当在常规仪式活动之外,将国家形象教育要求适时“植入”到体育竞技、社团组织、专题研讨以及课堂教学等活动之中,在唤起学生对祖国的积极情感的过程中坚定其爱国主义信念。

与网络舆论话语有效互动。网络舆论主流强调风清气正,但在自媒体发达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电子媒介消解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抑制主体的道德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媒介消解人的道德性,使道德主体成为他人不幸处境的远距离旁观者”^②。应根据信息时代知识与观念传播的方式和特点,有效开发与利用网络舆论话语中的教育资源。一是要提高学生识别有关国家形象的网络舆论话语背后价值理念、动机与目的的能力。要及时关注典型热点事件,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学习思考、理性思考、学会思考。二是要引导学生能够负责任地表达自身关于国家的言论或观点。既要有根据、建设性地关注、参与和表达关于国家事务的看法,又要充分预计个人言论或观点可能造成的影响。

四 新时代国家形象教育落点融合:价值认同与行为实践统一

国家形象三因素模型^③指出,认知成分(包括功能性维度、规范性维度和审美性维度)、情感成分(情感性维度)和意动成分(包括行为倾向和行为性质)是国家形象建构中渐次生成的知-情-行三个方面,揭示出国家形象认知、情感和行为之间的线性影响关系,但还缺乏从行为的角度深化认知和情感体验的反向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知行关系处理,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知,闻之

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行”是“知”的目的并且优于“知”,王夫之提出“知行合一”否定了两者界限,孙中山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难行易”。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观点,将知行关系理解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国家形象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既要重视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又需要将这种情感和信念化为具体行动,在个人生活、工作中努力奋斗。学校教育,一方面要推动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认同,“当个体认同并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就是要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自己行为选择的根本判别标准,并最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规范行为、调整行为和批判行为的指南”^④,另一方面,在主流价值认同规范行为的过程中,通过行为反向深化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形象教育实现价值认同和行为实践统一,需要紧密结合学生行为取向展开。国家形象教育落脚点是爱国,具体到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就是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这一目标需要落实、呈现为学习、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不仅要针对学生在与国家形象相关的行为中做了什么,而且要观察发现他们不做什么或不愿意做什么,以此作为教育的起点。比如在微信、QQ等社交媒体中,有人恶意损毁国家形象,其他人是选择沉默还是与之展开反驳;面对国家内政外交重大事件,是理性表达观点,还是发表过激言论或做出过激行为,抑或毫不关心?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状况可概括为不知不行、不知而行、知而不行和知行合一等类型,针对知行取向不同的学生,其教育内容和方式都应有所区别。明确学生行为表现中存在的各种偏差背后的认知与情感问题,是增加国家形象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起点。

国家形象教育实现价值认同和行为实践统一,需要落实为学校教育阶段实践的特殊属性。

①胡明辉:《大学网络舆情生态及其伦理学反思》,《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安冬,高德胜:《教育如何应对电子媒介对道德意识的消解——基于对远距离旁观者的剖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4期。

③常欣,王沛:《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结构:多学科的视角》,《中国外语》2018年第11期。

④杨希燕:《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个体价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年第4期。

国家形象的认知包括国家具体形态、象征形态和抽象形态,其情感包括情境性爱国、理性爱国和信念性爱国等不同层面,相应的实践指导各有区别。“学生的品德发展是一个观念认识、情感内化、践行反思相融合且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各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在兼顾多方面的基础上,再强调不同的侧重点。”^①国家形象教育中的实践,要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传统节日教育等具象活动层面基础上,达成学生通过努力应该能够完成的行为水平。可以是针对时政热点、社会舆论等方面设计国家形象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活动,如国家命运、发展道路、“中国梦”的共同理想等国家宏观发展如何与个人发展、知识学习有效结合。要充分利用社会实践、研学旅行等课堂教学内外的教育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

加深对国家现状的体验,尽可能搭建能让每位学生都能融入的实践平台,如社会公益活动、志愿服务、调研考察等等。理性反思提升学生在具体行为中获得的直接体验,通过螺旋上升过程深化学生的国家形象认知水平、情感深度和实践能力。

国家形象塑造和对外传播是提高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的基本手段,而国内的国家形象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学生群体的教育则是一个国家传承文化和凝聚人心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主题下,重构国家形象教育路径、服务“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仍需依据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实际情况,全方位融合到课程、教材、社会实践等具体教育活动之中。

On Integrated Routes of National Imag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LI Xue¹ & LI Jie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imag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Currently, the national image educ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unified knowledge inculcation, which neglects personal experience participation and behavioral ability training.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stage attributes, and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value identification with behavioral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self-recogni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outlook, the isomorphism of common memory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one-way inculcation with multiple discourses.

Key words: national image education; ideology; the New Era; integrated route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孙银光:《爱国主义教育的逻辑层次性及实践策略》,《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3期。